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中“社”的研究

赵亚楠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兰州，730000

邮箱: 1658734409@qq.com

摘 要：敦煌文书中有关“社”的记载是研究古代社邑制度的重要文献，《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涉及结社目的、结社性质、社官等内容。敦煌地区的结社活动主要是民间私社，其活动主要是民众的丧葬互助，唐宋时期社的性质与后世的专为祭祀的社的性质不同。唐宋时期敦煌的社官与后世的社首也有较大的差异。

关键词：敦煌文书；结社目的与性质；社官

收稿日期：2019-04-15；录用日期：2019-05-23；发表日期：2019-06-04

Study of “She” in Dunhuang Social and Economic Literature

Zhao Yanan

Colla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The records of “She” in Dunhuang documents are important documents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social and economic documents. *The first album of Dunhuang Shehuijingjiwenxian Zhenji Shilu*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deals with the purpose of association, the nature of associations, officer of “She” and others. The association activities in Dunhuang area are mainly private “She”, and their activities are mainly the funerals and mutual assistance of the people. The nature of the association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later generations. There are also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Dunhuang social officials and later generation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Key words: Dunhuang documents; Association purpose and nature; Officer of “She”

Received: 2019-04-15; Accepted: 2019-05-23; Published: 2019-06-04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社”，是学者们长期以来探讨的重要内容。敦煌文书中有大量关于“社”的记载，主要收录于《敦煌社邑文书辑考》与《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以下简称《释录》）（第一辑）中，这些前辈的学术成果，对后辈学者研究敦煌文书中的“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释录》第一辑中的第五部分《社邑文书》收录了大量关于社的文书，这部分共有：（1）“立社条件”16份，（2）“请求入社退社状”8份，（3）“社司牒状及处分”8份，（4）“各种转帖”87份，（5）纳詹历13份，（6）收支账与凭据7份，（7）其他10份。这些敦煌文书中记载了关于社约、社规、处罚、入社、退社，转帖等诸多内容，笔者在研读过程中发现敦煌文书里的“社”的一些特点与明清、民国时期的“社”有些相似之处。笔者拟就《释录》第一辑中收录的社邑文书提出自己的浅见。

1 关于敦煌文书中“社”的研究的特点

关于敦煌文书中“社”的研究，杨际平、郭峰、宁可、郝春文等学者研究成果卓著，他们不仅梳理了敦煌社邑文书的主要内容，也奠定了敦煌社邑文书的研究基础。

《释录》中有两份文书可以推断敦煌社邑文书的上下时限，一份为“唐至德二年”[1]，另一份为“宋太平兴国七年”[2]。这两份文书大致限定了学者研究敦煌社的时间范围，即唐中叶至宋初，因此唐末、五代、宋初的敦煌结社活动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如杨际平与郝春文两位先生基于敦煌文书进行的“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问题”的讨论，两位先生的讨论对于敦煌社邑的深入研究有很大帮助，在“社邑”性质、人员构成、量化分析等方面有了基本的结论，解决了这一时期敦煌社邑研究中私人结社性质、私人人员的阶级、阶层构成等问题，提出了如何运用量化分析的方法促进整个唐宋时期社邑研究的建议，得到其他学者的一致认可[3][4][5][6]。

学界对于唐代社会救济的研究也多从敦煌的社邑文书入手[7]。因此敦煌社邑文书成为研究唐至宋初社会经济、基层社会组织、社会救助等多方面内容不可缺少的文献。在《宋代会社研究综述》一文中，作者在谈及唐宋时期“社”的研究现状时，主要是敦煌地区的社邑研究，如：丧葬互助不仅是敦煌社邑经济和生活的最重要内容，也是敦煌社邑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孟宪实对结社原则、社人大会的地位，社人地位的论断；郝春文先生认为唐五代宋初的佛社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8]。

郭峰认为敦煌文书反映的结社活动应从中原地区传来[9]，由于同时代中原地区民间结社文献的缺乏，众多学者在研究唐宋时期的社时，敦煌的社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并以此来推论同时代其他地域的私人结社情况。

2 关于敦煌文书中结社目的与社的性质

众多学者研究敦煌文献中的“社”时，认为社是一种基层社会组织，笔者认为这种特性延续到了近代乃至现代。如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

中提到华北农村存在的四种社 [10]，均为基层社会组织；《通渭寺庙志》一书中诸位编者提到的“社”也有基层社会组织的含义。

《释录》第一辑中收录的“立社条件”文书 16 份 [11]，这些文书主要反映了唐末五代至宋初一些社成立之初所订立的社规，透露出了当时民众结社的缘由。这 16 份文书中有 5 份样式文书记载有“春秋二社”的字样，还有“社内每年三斋二社”字样 [12]。说明在结社之初，就已经规定了每年有固定的活动“社”或者“斋”。郭锋据此认为敦煌遗书中“社”的两种含义：其一是与农业的自然崇拜活动有关，人民按地域组织起来，按时致祭；其二是基于第一种活动而形成的民间结社活动，并成为一种脱离“里”这一基层组织的组织形式 [9]。笔者认为此处的“社”应为按时致祭，是民众祈祷丰收和庆祝丰收的活动，但不包含浓厚的政治色彩，也并不代表国家拥有土地和人民的意义。

在这 16 份文书中多为敦煌当地民众结社时的稿本，从这些文书中民众结社的目的还有：“逐吉追凶”与互助。关于“逐吉追凶”共有 7 份 [13]，可见这一目的是民众结社时的初衷之一。关于“逐凶追吉”一词的含义，笔者认为刘传启的解释较为可靠：追凶逐吉应为追凶或荣凶之义，即凶礼、吉礼等 [14]。宁可与郝春文在《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一文中，提到唐代厚葬之风盛行，敦煌民众结社的重要经济生活便是丧葬互助，也成为敦煌结社盛行的重要原因 [15]。因此可以断定，“逐吉追凶”与互助应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

关于互助这一目的，在一些文书中可以看到：

社内三大者，有死亡，赠四尺祭盘一，布貳丈，借色布两疋半。 [16]

若有凶祸之时，便取主任指挥，不问车舆，使虽营办，色物临事商量。 [17]

夫邑仪者，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值，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 [18]

这三条反映了结社社条中规定社内成员要相互帮扶。“唐至德二年（公元 756 年）正月十日投社人何清清状” [19] 在这份状子中，投社人何清清既无妻子家人，又无至亲，为了生存不得已而投社，不仅说明结社是为互助，也能够说明当时社具有某些社会救济的功能。另一方面因为在结社时或者社内成员有凶事时，社员需要交纳一定的社费或者其他财务，这对于一些较为贫苦的下层

民众而言，反而更加重其负担。如：

癸酉年三月十九日，社户罗神奴及男女英、义□三人，□缘家贫匮乏，种种不员（圆）。神奴等三人数件追逐不得，伏乞三官众社赐以条内除名，放宽闲。其三官知众社商量，缘是贫穷不济，放却神奴，宽免除名。神奴及男三人，家内所有生死。不关众社。[20]

由材料可知罗神奴请求退社的原因是家贫匮乏、贫穷不济，文献中并未提及社内的救济罗神奴，笔者认为这与结社时所定立的社条有关。在结社类文书，互助的情况多属于遇到凶祸时，因此神奴虽然家庭贫困，但不符合社条所规定的情况；同时根据社条，当社内成员遇到丧葬之事时，社内所有成员又必须无偿帮扶，提供所需的祭盘、布、色布等。神奴可能是因为无力提供这些，以及担心在互助活动时违时或者欠缺而遭到更大的经济处罚。

上引用材料反映出，互助不仅是民众结社时的强烈要求的目的，更是结社后的重要活动。郝春文认为春秋二社虽然很重要，但在当时人的观念中以及在实际生活中，互助活动更重要[5]。

透过结社的目的与活动，笔者认为可以判断民众所结之“社”的性质，对此郭锋、郝春文等学者认为这些社是纯粹的民间社会组织，与官方并无联系。同时郝春文先生考证渠人与渠社是较为特殊的存在：渠社中的渠人从事的一类活动是承担力役，这一活动受到了官府的控制和监督；而在力役活动之外，渠人结成的渠社中也有互助活动，而这类活动并未受到官府的影响[21]。

笔者认为这类社已经具有成熟的基层社会组织的性质，与杜赞奇研究华北农村时提出的“村中的自愿组织”[22]有相似之处，两者都基于自愿性，后者虽然也有救助活动，但是这与敦煌的互助有着明显的区别。敦煌地区当时虽然也存在着数量可观的佛社，但是较为盛行的还是互助社，这与明清北方地区以祭祀为主的民间自治组织有较大的区别。王福才、车文明的《对宋元明清民国祭祀组织“社”与“会”的初步考察》一文中提到，社一种为主要负责民间祭祀及寺庙维修，同时承担乡民教化、乡规民乐的制定，以及维护正义和公平；另一种是基于地缘的组织，负责乡村几乎所有的公共事务，具有类似行政方面的职责[23]。

唐末五代至宋初,敦煌地区的私人结社之风盛行,当地官府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郭峰认为除了敦煌地区特殊的政治、地理条件及社会活动本身未超越统治者的允许的范畴外,还有归义军时期,不仅仅是敦煌的民众在心理上的孤独感与强烈的自保的要求,统治者也有相似的心理。反观“社”这一基层组织之所以历经千年而未退出历史舞台,更多的是因为具有社会救济功能,而这种社会救济的功用也随着社一直延续下来。

3 关于敦煌文书的社官

在“社邑文书”前三种中关于“社官”的记载颇多。有“社官”记载的有:“立社条件”中 11 份,“请求入社退社状”中 7 份,“社司牒状及处分”5 份。可见在当时社必有“官”进行管理,这也是区分社内等级的标志,社众对于“社官”的命令必须服从。

出现的“社官”名称有:社长、社官、录事、社老、虞侯、三官等。其中“社长、社官、录事”这三个名称较为常见,共有 5 份文书;“三官”应是对“社长、社官、录事”三官的合称,共出现在 11 份文书中;“社老”与“虞侯”出现次数较少,分别为 4 份与 2 份。可见社内一般设置的官为社长、社官、录事三种,社老与虞侯可能为三官外的补充或者三官中某一职位的另一名称。

除这些社内官外,还有一种官应为社外人员,但其职权较三官高,一般处理社人的牒状。社司主要见于“社司牒状及处分”部分,共有 5 份出现社司。如:

社司状上

五月李子荣斋:不到人何社长、刘元振并斋麦不送纳,不送麦成千荣,行香不到罗光进。

右件前人,斋及麦,行香不到,准条合罚,请处分。

牒件状如前谨牒。

申年五月 日赵庭琳牒

附案准条处分,庭琳。

廿一日。[24]

从这段文献来看,桩子内容涉及请求处分之人、处罚原因、社司的批复等

主要内容。可见当时社司的主要职能应是处理各社提交的请求处分的文书之类。因这份文书中涉及社长，可见当时社内虽然有严格的上下等级划分，但是对于社规，还是对社内全体成员有约束力。同时违反社规进行处罚时，需要更高一级的机关同意才可实行，而社司则充当了这一职能。

而明清民国时期，社官的名称常见的有“社首”“维首”等，主要见于庙宇修缮的功德碑，这些社官带有行政色彩，起到了联系政府与民众的功能。而到了近代，社首特别是总社首，往往由乡村负责人担任。[23]

4 敦煌文书中的社与后世的社的差异

前文已经述及“社”这一基层社会组织延续了上千年，但是敦煌文书中反映的唐宋时期的“社”与笔者了解到的明清时期的社、今日甘肃地区存在的“社”有一些相通与差异。

陈宝良在《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中，将社的含义总结为：（1）为民间共同祭祀的土地神，社庙则作为立国根基的象征；（2）指古代乡村基层行政单位；（3）指民间在社日举行的各种迎神赛会；（4）指信仰相同、志趣相投者结合的团体；（5）行业性团体，如唐代的“社邑”。[25] 在笔者收集到的一些明清山西的修庙功德碑中，“社”这一名称经常出现，笔者分析这些社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对村外言，代表这一村；其二是对村内，社内成员有着共同信仰或其他相同属性，一村社内又可划分为多个小的社，这些社与会有着相同的含义。

在《通渭寺庙志》一书中，所收录的寺庙述及该寺庙所辖范围时，有“社域”、所辖几社共多少户多少口等文字，在一些寺庙也列出寺庙归属地的历任大会长及各社社头。笔者认为此书中涉及的社有两类含义。

其一是基于同一神灵信仰而结成的宗教性组织，这类组织不仅基于信仰，更基于地域，往往是在寺庙附近的数个自然村庄自愿组成。这与杜赞奇先生总结的“超出村界的自愿组织”[26]有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杜赞奇总结的组织往往是几个村中一部分民众结成自愿的，而通渭县存在的是全村民众均加入的组织。此类社与王福才与车文明两位教授提出的民间会社的性质、职责类同[23]。其二是“各社社头”之社。这类社的规模往往是一些规模很小的自

然村，全村为一社，是第一种类型的组成部分。

关于敦煌文书中的“社”，笔者认为虽然记载的是唐末五代至宋初之事，研究这些文书，不仅对于了解当时敦煌地区的社会现状有极大帮助，其中的一些问题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宋代以后的会社组织，对于研究近现代的基层社会也有极大裨益，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唐耕耦，陈宏基.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G].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291.
- [2] 唐耕耦，陈宏基.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G].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279.
- [3] 杨际平.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J]. 中国史研究，2001(4)：77-96.
- [4] 杨际平.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几个问题的再商榷[J]. 中国史研究，2005(2)：53-65.
- [5] 郝春文.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商榷[J]. 中国史研究，2003(1)：89-102.
- [6] 郝春文. 再论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J]. 中国史研究，2005(2)：67-76.
- [7] 黄新华. 1985 年以来国内唐代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477-478+508.
- [8] 董春林. 宋代会社研究综述[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9(6)：51-57.
- [9] 郭锋. 敦煌的“社”及其活动[J]. 敦煌学辑刊，1983：80-91.
- [10]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M]. 王福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11-122.
- [11] 唐耕耦，陈宏基.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G].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269-290.

- [12] 唐耕耦, 陈宏基.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G].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269, 280, 281, 283, 284, 285.
- [13] 唐耕耦, 陈宏基.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G].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273, 274-275, 280, 281, 283, 284, 285.
- [14] 刘传启. 敦煌民间结社丧葬救助研究[J]. 求索, 2015(12): 172-176.
- [15] 宁可, 郝春文. 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6): 32-40.
- [16] 唐耕耦, 陈宏基.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G].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269.
- [17] 唐耕耦, 陈宏基.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G].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273.
- [18] 唐耕耦, 陈宏基.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G].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274-275.
- [19] 唐耕耦, 陈宏基.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G].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291.
- [20] 唐耕耦, 陈宏基.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G].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296.
- [21] 郝春文. 敦煌的渠人与渠社[J].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0(1): 90-97. <https://doi.org/10.1111/j.1099-1107.1990.tb00007.x>
- [22] 杜赞奇. 文化, 权力与国家: 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M]. 王福明,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113-114.
- [23] 王福才, 车文明. 对宋元明清民间祭祀组织“社”与“会”的初步考察[J]. 中华戏曲, 2007(1): 32-46.
- [24] 唐耕耦, 陈宏基.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G].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6: 298.
- [25] 陈宝良. 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 22-26.
- [26] 杜赞奇. 文化, 权力与国家: 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M]. 王福明,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114-116.